

明末清初词人社集 与词风嬗变

王雨容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明末清初词人社集 与词风嬗变

王雨容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末清初词人社集与词风嬗变 / 王雨容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221-12699-3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4146号

明末清初词人社集与词风嬗变

责任编辑 刘泽海

装帧设计 黄红梅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221-12699-3

定 价 68.00元

投稿邮箱 haiyang380@126.com



自序

清词之盛，肇自明末。天启、崇祯时期，起废振衰，词风丕变。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异军突起。相邻的西陵（杭州）、柳洲（嘉善）、梅里（嘉兴）、阳羨（武进）等地词人，群起影从，桴鼓相应。自此风气遂开，形成了明末词坛初盛的局面，入清而此道益昌。称雄于清初的浙西词派，正是这种风会所趋和西陵、柳洲、梅里、阳羨等地词派融汇的一个直接结果。

明清之际，词人社集频兴，词人们一起讨论词学、评论词作、填词唱和、编选词集。掀起了词学的又一次高潮，促进了清词的中兴。本文即以明末清初这近一百年时间为研究阶段，围绕当时的词人社集活动，全面考察这一时期词人社集活动的情况，探讨词人社集活动与词风嬗变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首章为绪论。首先说明了选题依据，然后分析了当前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了全文的研究构想；指出词人社集活动研究的匮乏，突破了词人社集活动被狭隘地理解为词人雅集唱和的观念，从三个方面揭示明末清初的词人社集活动：社集论词为理论指导，社集填词来繁荣创作，社集选词是巩固流传。

正文重在探寻明末清初词发展的脉络，以词人的社集活动为研究对象，从词风的嬗变角度去着手，以时间为线索。共分五章，总的结构是总分总的结构：第一章，明末清初词人社集总论，从词人社集的渊源、影响词人社集的因素、词人社集的分类、词人社集活动与百派腾跃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明末清初词人社集活动的情况。明末清初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词派或词人群体，如云间词派、柳洲

词派、西陵词派、广陵词人群、阳羨词派等，这些词派的形成和发展都和词人社集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章在对词人社集的渊源、词人社集活动的形式、影响词人社集活动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之后，重点考察各词派与词人社集活动的关系，如云间词派与云间词人社集活动、柳洲词派与“柳洲八子”社、西陵词派与“西陵十子”社、广陵词人群与广陵词人社集、阳羨词派与阳羨里中词社的关系。第二章至第四章为分论，按照时间顺序，将明末天启、崇祯时期到清初康熙末年这段时期的词人社集活动作梳理，探寻词人社集与词风嬗变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主情”词风笼罩时期。“主情”词风笼罩时期指明天启、崇祯至清康熙四年这个时期。由云间词派开端，后来的柳洲词派、西陵词派到广陵词人群都受云间词派的影响。虽说这个时期是受云间词风的影响，但这个时期不完全是云间词风，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但在“主情”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因此笔者意以为取“主情”词风笼罩时期较为恰当。第三章，“尚气”词风激荡时期。这个时期指康熙四年到康熙十八年，词作的题材范围更广，词的风格更为多样，最主要就是“稼轩风”的盛行。但光稼轩风也不能概括此段时期的词风特点，而明显一点是此时词人更注重了词的意义，所以以“尚气”词风来概括。第四章，“崇雅”词风一统时期。指康熙十八年至康熙末这一段时期，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开始统治词坛，朱彝尊倡导“醇雅”词风，而“醇雅”词风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提高词的品格。第五章为总论，论述词人社集与众派合流之间的联系。到康熙十八年之后，由于清朝统治的巩固，清朝右文政策的实行，词坛由百花齐放逐渐形成了一枝独秀，即浙西词派占统治地位。本章在分析众派合流的因素之后，重点阐述了各词派汇入浙西词派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都伴随着词人的社集活动。这种总分总的结构也暗合了明末清初词坛的变化规律，即由云间词派一派开始，中间经历百派腾跃的过程，最后到浙西词派一统天下的结局。但是清代词学在百派归一之后开始走向了衰微，明末清初词学正如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都摆脱不了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

结论部分从整体上论述了明末清初的词人社集活动经历了同里相聚、跨地唱和、同调相应三个时期，伴随着社集活动的变化，明末清初的词风也发生了三次嬗变。到康熙后期，词人社集失去了“唱”、“和”两个基本条件而逐渐冷落，词学也走向了衰微。



引 言

本文拟以明末清初词坛的文人创作作为研究对象，动态地把握这个时期词学的发展与流变。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词人创作实际的研究我认为，明末清初词人主要以一种介于社团和雅集之间的特殊方式“社集”来进行词学活动。在论述该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词人社集”的概念予以界定。

一、“词人社集”的概念界定

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曾几次提到“社集”这个概念，如在论及广陵词坛时，他说：“广陵词坛的社集酬唱、合操选政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是兼容并蓄，包纳各种审美情趣的宽宏气象。”^①在论“秋水轩倡和”时，又道：“‘秋水轩倡和’发生在康熙十年（1671）秋，是‘辇毂诸公’发挥影响力的一场社集性质的群体酬唱活动，也是‘稼轩风’从京师推向南北词坛的一次大波澜。”^②严先生虽然没有对“社集”两字做解释，但他明确指出明清词人群体活动具有社集性质，因为只有“社集”一词才符合明末清初词人活动的特点。

首先，明末清初词人群体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词人社团，并没有以词社

①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命名。词人结社最早应追溯到南宋末年，由杨缵、张枢、周密等结成的西湖吟社，这是一个纯粹的词人社团，注重音律。到元、明时期，由于词学的衰微，这种纯粹的词社几乎不再出现。直到清代中期乾隆年间，由王时翔举行的“小山词社”，才又出现纯粹以词学活动为目的的词人社团，并且是第一次以“词社”命名。晚清是词社的兴盛期，从道光到光绪年间，涌现了一些专门的词社，如以吴中沈曰富为主的“红梨社”、江苏秦耀曾等组织的“江东词社”、金安清在江苏泰州军中组织的“九秋词社”、闽中许赓畴组织的“梅崖词社”、闽中谢章铤组织的“聚红词社”、程颂万在长沙组织的“湘社”、王鹏运等在北京成立的“咫村词社”等等。明末清初没有这种纯粹的词社，词人活动大多是以一个文人社团为依托，如云间词人就是以几社为词学活动的平台。明代是文人结社的一个高潮，这些社团最初大多是应科举之需而成立的，进而发展到具有政治倾向。入清之后，满清统治者对这类社团采取了禁止甚至镇压的措施。清廷所严加禁止的，是有政治色彩的，特别是反清的诗文社盟，而对纯粹诗词唱和、流连光景的社集活动则很少干涉。清初文人为词学而举行的社集活动虽然很频繁，但没有成立一家专门的词社。

其次，明末清初的词人活动又不是那种简单的雅集活动。文人雅集活动一般来说比较随意，从参加人员到举办地点都没有固定，雅集活动也只仅限于诗词酬唱。明末清初词人社集活动相对这种随意的词人雅集则正式得多，不光活动地点较为固定、参加人员比较稳定，而且活动持续的时间较长，活动方式多样。根据明末清初词人活动的特点，笔者将“词人社集”定义为：有相对固定的场所、有相对稳定的词人、活动持续时间较长、活动方式多样的词人群体活动。

在方式各样的词人社集活动中，又以社集论词、社集填词和社集选词三个方面为最主要。同一个时期的词人会对当时一些共同关心的词学命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通过这种探讨乃至争论，原来相同的观点更加明晰、更加系统，原来不同观点的趋于一致，最终形成共同的审美倾向，为词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末清初词人社集填词主要是社集唱和。明末词人唱和的形式主要为同调同题唱和，如云间词人的唱和，从他们的两部唱和词集《幽兰草》和《唱和诗余》都可看到这种特点。到清初时候，词人的唱和则主要是同调同韵唱和，往往一调



数篇、一韵数阙，像清初的几大唱和——江村唱和、广陵唱和、秋水轩唱和都是这种形式。康熙中晚期的唱和则又转向了同调同题唱和，如乐府补题唱和。

明末清初词的选本大量出现，这些词选大多也是词人社集活动的结果，是多人集体编选的结晶。词选不仅可以保存当时词坛的许多珍贵的资料，还能反映一个词派的理论主张。

二、明末清初词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重大的转折点之一。刘梦溪先生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流变，有三个历史分际之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都是天崩地裂、社会转型、传统价值观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竞变的时代。”^①同时，明清之际也是古代文学的重大转折点之一，“国家不幸诗家幸”^②，社会的变革往往促成文学创作的重大突破和繁荣。陈伯海先生指出：“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三次高潮，即周秦之交、唐宋之交和明清之交，分别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开始、士大夫正宗文学的全面成熟、整个古典文学到了总结的阶段。”^③

词学在明末清初也到了一个总结性和开拓性的阶段。整个词史的发展走向，是一个“马鞍形”，即两头兴旺，中间衰微，隋唐、两宋、清代是词的兴盛时期，元、明是词的衰微时期，特别是明代，可以说是整个词史的最低潮。历代词论家都对此有过言论，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中言：“论词于明代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④陈廷焯甚至有言：“词至于明，而词亡矣。”^⑤这种言论几乎成为共识。但是，词在经过极度低迷之后，至明末却再度复兴，至清初则大放异彩，词家辈出，佳作纷呈。现已出版的程千帆先生主编《全清词》“顺康卷”

①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华读书报1996，12（26）。

② 赵翼：瓯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③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⑤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计20册，1000万字，收录词人2105家，词53400余首；2008年由张宏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清词·顺康卷补编》计四册，补得词人四百五十五家，词作一万余首。据严迪昌先生估算，“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二十万首以上，词人也多至一万之数”^①。词作和词人数量虽不能全面说明问题，但至少也表现出清词繁荣的气象，特别是清词的题材极大地突破，“可以说，只有到了清代，词才彻底突破了‘诗庄词媚’之类的旧说，真正成为在描写对象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抒情诗体”。^②清代的词史和整个词史发展一样，走的也是一个“马鞍形”的轨迹，清初和清后期是词发展的辉煌时期，成就最高，清中期则相对冷落。讲到清词，绝不能与明末脱节。词经过明中期的衰微之后，到明天启、崇祯期间出现起衰振废的气象，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露出了词学复兴的曙光。本来，明清词人的划分就很难有个明确的概念，如果纯粹以卒于清代来分，是不科学的划分标准。因为许多卒于清代的词人，他们的主要词学活动在明代。比如徐士俊、王翊、万寿祺、王庭、李雯、吴伟业、李渔、曹溶、陆圻、金堡、宋琬、龚鼎孳、曹尔堪、尤侗、施闰章、宋徵舆、王夫之、吴绮、沈谦、毛先舒、丁澎、严绳孙等。从词学的发展来看，明末清初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然分开。

明末清初的词派呈现很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在学界已形成共识。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就指出：“清代词派和群体非常突出地具有地域性和家族血缘关系的特点。”^③张宏生先生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一书中辟专节论述清代词派的地域性特征，^④孙克强的《清代词学》一书中也有专节论到清代词派的地域性特征，^⑤具体内容见其相应章节，这里不再赘述。词派研究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徐珂先生的《清代词学概论》的第二章专门辟“派别”一章，他只提到浙派和常州派，他说：“有清一代之词，有二大别，一浙派，一常州派。亦犹散文文之有桐城、阳湖二派也。”^⑥此后，浙派和常州派

①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③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 孙国强：《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 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大东书局，1926年版。



引言

就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热点，任二北先生、刘宣阁先生、龙沐勋先生都有过论文论述。1993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严迪昌先生的《阳羨词派研究》一书，揭开了其他词派研究的序幕，随后，云间词派、柳洲词派、西陵词派、吴中词派等词派陆续被研究者挖掘出来，李越深的《云间词派研究》、刘勇刚的《云间派研究》、谷辉之的《西陵词派研究》、金一平的《柳洲词派》、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等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加上浙西派和常州派依然是研究者的热点，清代的词派研究可谓热闹非凡。然则，本人对词派研究有两点始终难解的疑虑：其一就是正名问题。什么是“词派”，现在的词派概念，严迪昌先生已经有了个说法。严先生在《清词史》中将词派定义为“必须首先得拥有一面旗帜，即领袖式的足以能凝聚团结起同辈和后进的有权威性的大作家，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可观的有影响的作家群体。他们在艺术情趣、审美倾向以至理论主张上应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实践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他们编纂的总集和选本之中。”^①在这四原则中，“领袖人物”、“作家群落”、“类似流派宣言式的选本或作品总集”^②这三项是硬性的，好把握，唯独这个“一致的审美倾向”这个原则是很难界定的。清初的许多词人在词学观点上都有过变化，我们该将词人的哪种观点作为他的审美倾向呢？况且，清初的词派之间是互相渗透的，张宏生先生在《清词流派的发展状况及其文化特性》^③一文中指出了清代词派的地域性特征、批判性特征、阶段性发展及渗透与中和的四大特征，论述其渗透与中和的特征时，张先生以陈维崧与朱彝尊为例，说朱彝尊标举清空，然词中亦有迦陵风调；陈维崧也受浙派影响，有大量的咏物词，模仿《补题》的痕迹也很明显。如果将朱、陈二人划为一个词派，显然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那么又如何来划分词派呢？是不是只要是同一地域的词人都在同一词派呢？其二就是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这是由第一个问题引申而来。由于词人的词学观点和词作风格是在不断地变化的，那么词派也绝对有个成长发展的过程，这大概是词派研究最需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既然是词派研究，就首先要弄清词派的形成过程，不能将词派研究等同于多个词人研究，在词派研究文章中将词派中的人物情况进行具体的梳理完事。我们如果还

①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构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原到明末清初词学的历史现状去看的话，决定词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时代风会，而不是词派。前面讲的张宏生先生指出的清初词派的渗透与中和的特征是看到了问题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追寻下去，肯定会追到风会这个根子上的。刘永济先生曾指出：“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于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①确为中肯之论。厉鹗曾反对这种以派来言诗词的说法，他说：

诗之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可以陶冶得也。……自吕紫微作江西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②

厉鹗确实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是“瓣香所在，强为胪列”。就是因为这种主观性，因此也导致了后代学者在流派上有许多纠缠不清的论争。我们平时常说朱彝尊这个浙西词派的领袖，但其实朱彝尊本人是反感言派的，他在《冯君诗序》中云：“吾于诗无取乎人之言派也”，“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为流派，善诗者不乐居也”。^③可见，所谓浙西词派又是后人强加给朱彝尊的，也不管人家乐意不乐意了。

为避免词派研究中的主观随意，肖鹏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一文中提出“词人群研究法”。^④这是很有道理的提法，是在对当今词学研究的缺点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今盛行的词派研究和词体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研究者自己的主观臆断进行的按需归纳。“因为使用概念不一致、审美角度不一致、作品归纳方式不一致，学术界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分派、分体、分期说法。这些分派、分体、分期的说法，往往是研究者经验回忆和主观站队的概括。他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历史规律，重建了词坛原貌，各有发现，各成体系，但相互之间很难承认并达成共识，缺乏兼容的基础。更重要的

① 刘永济：《词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厉鹗：《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 朱彝尊：《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

④ 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9年版。



是，它们与历史原态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距离”^①。词人群的研究就避免了这种主观臆断，因为词人群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有天然的唱和交游等人际关系作为依据，在最大程度上贴近历史原貌。

群体研究法确实有一定的进步，但还是静止的研究方法。不论是词派研究，还是词人群的研究，都必须和词人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否则会有以下缺点：

其一，缺乏整体观念，归纳标准牵强。

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地域文学总的来说还是处于主流文化之下。地域文学的形成，是同一地域的人，因为客观自然的条件，比较容易相处交往，从而形成许多共同的东西。因此往往在分裂或动乱的年代，地域文学的特征就显得尤为突出，而一旦国家统一或处于盛世时，地域文学往往为主流文学所代替。况且，如何划分词派或词人群体，如果光从同一地域来分的话，则难免牵强。比如广陵词人群中，大部分的词人都不是广陵本地人。之所以将这些词人划为广陵词人群，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相聚在广陵。这样说来，划分词人群体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应该是词人的交往，而不完全是词人的籍贯。

其二，遮蔽词坛变化，忽视词派发展。

由于将词坛割裂为一个个以地域命名的词派或词人群体，将其局限于小的范围作静态的研究，缺少将这些词派放在整个词坛背景下来考察，难免遮蔽了词坛的变化，有盲人摸象之嫌。况且词派也不是一下就形成的，它有发展成熟的过程，如果不从他们的活动去探讨，则很难弄清词派形成发展的历程。

其三，无视词人成长过程，词风分析单一。

词和其他的文体一样都是后天习得的，每一个人都有个学词的过程，其词风自然也会变化。在明末清初的词人中，词风都发生过变化的不乏其人，如陈维崧，早年的词是绮艳的，后期转为豪放。这些变化，固然和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但词人的交往活动，对词人词风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所以研究词人也好，研究词派或词人群也好，都必须和词人的活动结合，才能避免静态的研究和一些牵强附会的意见。

^① 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9年版。

三、词人社集研究新构想

如上所述，词派研究或词人群体研究，都是静态研究方法，尽管对于词学研究是必要的，从客观上弄清了明末清初词坛的特点，梳理了各地域词学发展脉络，但要宏观地把握明末清初词坛的发展演变，就必须进行动态研究。而动态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词人的具体活动入手去还原词坛的本来面貌，词人社集正是词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对词人社集的研究十分薄弱，还没有一部专著探讨这个问题。清词研究的著作中有人提及，如孙克强的《清代词学》中“文人结社唱和风气之风流余韵”一节，简单地提到了清初词人的几次大的唱和。^①论及明末清初词人社集活动较多的是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清词史》将清词的流变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对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描述。全书以其自成体系的逻辑结构和清理整合文献的高超方法，对明末至清末的词风特点和演变脉络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煌煌四十万余言，凡重要的清词人、词风、词派，无不网罗殆尽，其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即在于全景式的流变的关照”。^②当然，因为《清词史》涉及的内容太多，词人社集活动只是在谈到具体词人时，附带论及，缺乏系统性。单篇的有关词人社集活动的论文也不多，大多停留在几次大的社集唱和上，如“江村唱和”、“广陵唱和”、“秋水轩唱和”、“乐府补题”唱和。前三次唱和都和曹尔堪有关，在一些以曹尔堪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都提到如陈谦的硕士论文《曹尔堪词研究》^③一文有专章论述。对清初的这三大唱和，还有单篇的论文，如朱秋娟的《“江村唱和”考述》^④，考证出“江村唱和”分为两组，一是曹尔堪、宋琬、王士禄三人在西湖唱和，结集为《三子唱和词》；另一组由曹尔堪、尤侗、宋实颖唱和于苏州，结集为《后三子词》。李桂芹的《秋水轩唱和活动及其意义》^⑤，对秋水轩唱和活动进行了梳理，概括出

① 孙国强：《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曹旭：《全景式的清词流变关照——评严迪昌新著清词史》，《文学遗产》，1991（3）。

③ 陈谦：《曹尔堪词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④ 朱秋娟：《“江村唱和”考述》，《中国韵文学刊》，2009（3）。

⑤ 李桂芹：《秋水轩唱和活动及其意义》，《长春大学学报》，2008（4）。



其唱和活动的特征，论述了秋水轩唱和的意义。张世斌的《朱彝尊酬唱〈乐府补题〉咏物词风格成因》^①，重点分析了朱彝尊词风变化的成因。在上述文章中，人们还是将词人社集活动狭隘地理解为词人唱和，其实，词人唱和只是词人社集活动的一个方面，词人社集活动还包括词人一起论词、评词和选词等方面。张宏生先生的《王士禛扬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②一文，对王士禛在广陵组织的红桥唱和进行了论述之后，进一步论述了广陵词人群的选政，突破了词人社集活动的范围。《词学》第八辑所刊严迪昌先生的《〈乐府补题〉与清初词风》^③一文首次将词人社集活动与词风嬗变联系起来。在文中，严先生高度评价了《乐府补题》的作用，他认为《乐府补题》的重新问世引起了清初词风的嬗变以至影响着整个一代清词的发展。在文章结尾，他提出了清初词风出现了三次嬗变，一次是王士禛主持扬州词坛，一次是秋水轩唱和，第三次是《乐府补题》复出。这都是有相当见识的。

学习填词，就像人类其他任何知识的掌握一样，是从模仿开始的。模仿的对象不外乎前人和时人，就词来说，前人主要是唐五代和两宋的词人。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模仿的对象，又受当时某些词坛领袖的影响。当然，词坛的繁荣或一种词风的兴盛，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领袖们的“倡”，二是其他人的“和”，这两者缺一不可。谈到明词的衰微和清词的中兴，这个最根本的理由是不能忽视的。陈子龙在《幽兰草词序》中就指出明词不振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刘基这样的大家轻视词，整个文坛也是重传奇而轻词体。^④这是讲到了点子上。与明代的情况相反，清初的文坛则盛行填词，甚至超出了作诗，当时的人就认识到这点，如李渔说：

今十年以来，因诗人太繁，不觉其贵，好胜之家，又不重诗而重诗之余矣。一倡百和，未几成风，无论一切诗人，皆变词客。即闺人稚子，估衣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者，尽解作长短句。^⑤

① 张世斌：朱彝尊酬唱“乐府补题”咏物词风格成因，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3）。

② 张宏生：王士禛扬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文学遗产，2005（5）。

③ 严迪昌：阳羨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

④ 陈子龙：安雅堂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⑤ 李渔：词集自序，笠翁文集余集。

“一倡百和”，这正是清词中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倡和是两个必要条件，光有“倡”，没有“和”，也是不能成风的。前人的词论中有许多言论都谈到这种倡导对清词中兴和某种词风影响的作用。如谢章铤曾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竹垞以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①最著名的是清初那位成就较高、年寿较长、经历丰富的词人——顾贞观的那段话，特引述如下：

自国初鞞榘诸公，樽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岩（龚鼎孳）、倦圃（曹溶），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簦才子，并与宴游之席，各传酬唱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亦难泯。最后，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骖骖，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谈。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而言诗古文辞。回视《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②

顾氏的这段话，很清晰地勾勒出清初六十年词的发展历程。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龚鼎孳、曹溶等领袖词坛，在他们的倡导下，吴越一地“闻风竞起”，这正是明清之交时期，这些人大多是经历了明清易代的痛苦体验，是“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将词作为抒发内心郁闷的手段。第二阶段是王士禛在广陵领袖词坛数载，在他周围有邹祗谟、彭孙遹等“二三同学”，他们组织唱和、谈词说艺、撰写词话、编选词集，一时词坛热闹非凡。第三时期由纳兰性德成为京师词坛的组织者，“欲尽招海内词人”，像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严绳孙等等一批词坛大家都聚集京师。后来王士禛轻视作词，词坛少了倡导的人物，于是又恢复到明中期的状况，走向了衰微。

由此可见，词人的社集活动有助于增加文人的凝聚力、增强彼此的文学交流，对词人聚合成词人群体、进而形成词学流派有着积极作用。同时，社集酬唱、刊刻社稿等活动还有利于文学的广泛传播，颇能扩大流派的声势和影响。

①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统一笺注：《饮水词笺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



总的来说，词人社集的作用与功能有以下三点：

其一，提供一个学词的场所。词因为不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因此很多文人在应付科举考试时无暇顾及此道，一直到功成名就之后，才因为交往的需要，学习“声韵之学”，吴伟业就是个鲜明的例子。乾隆《镇洋县志》卷十四《杂缀类》引《焚余补笔》云：“王中翰吴述吴梅村语：‘余初第时不知诗，而多求赠者，因转乞吾师西铭。西铭一日漫题云：半夜挑灯梦伏羲。异而问之，西铭曰：尔不知诗，何用索解。因退而讲声韵之学。’”这段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吴伟业在他刚刚考中进士的时候尚不会做诗。但形势所迫，因为他是两榜联捷，自然名声大震，这时求他题诗的人也很多，而自己又不精此道，于是只好求助自己的老师张溥。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何况朋友聚会，常常是当场唱和，那时说不出的话，该是多么难堪。加之张溥的一句“尔不知诗，何用索解”的讽刺话刺激了他，于是吴伟业开始学习“声韵之学”。对这则材料，自然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据叶君远考证，是确有其事。^①近代词学大家朱祖谋最初也不解词，是王鹏运举办词社时，强拉他入社，他才开始研习词学，终成大家。这则材料记载在《近词丛话》中：

朱古微为倚声大家，著称于光宣间，其所著为彊村词。尝视学广东，未满任即解组归。尝曰：“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王幼霞给事时举词社，强邀同作。王喜奖借后进，于予则绳检不少贷，微叩之，则曰：‘君于两宋涂径，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复约校梦窗四稿，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旁皇求索为之，且三寒暑，则又曰可以视今人词矣。示以梁汾、珂雪、樊榭、稚圭、忆云、鹿潭诸作。会庚子之变，依王以居者弥岁，相对咄咄，倚兹事度日，意似稍稍有所领受，而王则翩然投劾去。辛丑秋，遇王于沪上，出示所为词九集，将都为半塘定稿，且坚以互相订正为约。予强作解事，于王之闕指高韵，无能举似万一。王则敦促录副去，许任删削，复书至，未浹月，而王已归道山矣。自维劣下，靡所成就，即此赧赧小言，度不能复有进益，而人琴俱逝，赏音阒然，感叹畴昔，惟有

^① 叶君远：吴伟业评传，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

腹痛。”既刊之半塘定稿，复用其指，存拙词若干首，以付剖氏。^①

朱祖谋深情地回忆了王鹏运拉他入社、指导他学词的经历。正是王鹏运举办的词社，为当时一些文人提供了研习词学的场所。当时除朱祖谋之外，郑文焯等人也是在王鹏运的影响下而走上词学道路的。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所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郑文焯进京会试，“时王佑遐给谏（鹏运）举咫尺词社，邀先生入社，朱古微侍郎（祖谋）、宋芸子检讨（育仁）皆当时社友也”。^②

其二，改变一个人的学词途径、词学思想，进而影响其词作风格。况周颐是在加入王鹏运组织的词社之后，受王鹏运的指导和影响，接受了王鹏运“重拙大”的理论，改变了先前侧艳的词风。也正如此，况周颐相当看重词人社集的作用，他认为学词“必印证于良师友，庶收取精用闳之益”^③。他还给初学者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说：“初学作词，最宜联句、和韵。始作，取办而已，毋存藏拙嗜胜之见。久之，灵源日濬，机括日熟，名章俊语纷交，衡有进益于不自觉者矣。手生重理旧弹者亦然。离群索居，日对古人，研精覃思，宁无心得，未若取径乎此之捷而适也。”^④他建议初学者联句、和韵并非要他们作出“名章俊语”，而是要他们融入词人群体的创作中去，通过唱和学习师友们的长处，训练自己的创作能力，所以他告诫初学者不要“藏拙嗜胜”，而是以谦虚平和的心态与词友们切磋。

其三，词人社集唱和更能激起词人竞争之心，从而创造出优秀的词作来。杜浚在《词引》中谈到“秋水轩唱和”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和成就的原因时，是从词人们的这种“相竞之心”这一角度来谈的，他说：

调高寡和，自古记之，余独谓此言非也。夫调不高，则未由发和者之兴，而生其相竞之心，彝然不屑矣，则是调卑寡和耳。高者岂其然乎。诸以顾庵学士坐秋水轩词证之。当时景物会心，偶然下笔，遂成绝唱。合肥宗伯，素擅花庵玉林之誉，一见和之，穷工极巧至如干首，所

① 徐柯：近词丛话，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民国铅印本。

③ 况周颐：蕙风词话，词话丛编本。

④ 况周颐：蕙风词话，词话丛编本。